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 陈家刚

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既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步。

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我国协商民主的定位、制度规范和渠道、基本要求和内容等方面，较为系统地勾勒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蓝图。2014年，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新的论断和新的阐释，为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2015年2月9日，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全面总结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成功做法与经验，立足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就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作出了总体部署和顶层设计。

二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逐步推进。在中央层面，《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围绕协商民主的特定内涵、发展历程、重要意义、指导原则、主要渠道、制度体系与程序，以及党的领导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释并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协商民主、为什么要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怎样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等一系列关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随后，协商民主各方面具体制度安排如《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也相继出台，“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的框架逐步形成。

三是协商民主的实践体现出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特征。从政治协商、政协协商，到立法协商、行政协商，以及社会协商对话、基层协商民主、网络公共论坛等，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从纵向讲，覆盖中央、地方和基层社区，是一个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实践；从横向看，协商实践涉及国家政权机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更有党派和人民政协组织，同时也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从结构上看，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涵盖立法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政党制度、自治制度等等，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基本形成；从技术上看，协商实践，既有利用常态的、规范的制度平台开展的活动，也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支撑的尝试。因此，广泛、多层、制度化既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目标，也是其最为基本的特征。

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智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有助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有助于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助于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但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实践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些需要克服的挑战。例如：关于协商民主建设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统一，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所需要的理论体系还需要深入研究，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规范性合理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等等。

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首先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即深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探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容，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国土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国土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历史传承性，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重要体现的体制机制。

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继续深化对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历程、协商民主的哲学基础和文化传统、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和程序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推出新的成果；系统梳理和认真总结我国各地党政部门创造的新鲜经验，加大国际传播，推动在民主问题上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以及民主问题上的中国话语权；可以考虑在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中成立专业性研究机构，深入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大力推进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原理、发展史、认识论、方法论等理论体系研究。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关键在于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层级，在已有的制度规范框架内，嵌入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要求。通过各种渠道的协商民主制度，进行创新实验，从实践中寻求理论层面的突破。例如：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中，增加协商讨论环节；在基层换届选举中，增加协商环节；在预算审议等方面增加协商讨论的要求；在人民调解的制度规范中，增加协商要求，等等。目的在于巩固既有政治制度、体制机制的权威性、稳定性，从而构建以《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为统领的，“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具体来说，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代表候选人的确定要经过充分协商和讨论，加强代表联系常委会的机制建设，健全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或选举单位的制度，使民众能够真正参与政府决策；加强立法协商，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法律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在党际民主中用好协商民主，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民主党派要充分利用在全国政协大会、常委会、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等机会建言献策；进一步强化人民政协作用的发挥，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把政治协商纳入政府决策程序；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

在国际国内其他重大问题上，善于传播协商理念、善于运用协商技巧、不断完善协商制度。例如：在国际冲突问题上，积极推动民主协商，包括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等；在国内不同区域、不同行政区等重大问题上，善于在党和国家既定方针下，推动具体的协商对话活动等。同时，利用协商民主理念，不断提高中国在重大问题上的议程设置能力。

推动协商民主的程序设计。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既涉及宏观层面的权力制度安排问题，也有在中观层面的法治化问题，更有在微观层面的技术性问题。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需要有具体的、可操作的、程序性的方式来体现。可以通过高校、科研机构等多方面的力量，推出一种既灵活多样，又能普遍适用的操作程序，使不同层级、不同地方的协商民主实践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

不断增强协商民主成效。首先，建立健全协商结果跟踪制度，对协商结果进行合理评估，强化对社情民意信息的跟踪反馈；同时要注重探索把落实协商意见建议纳入民主评议范围之中的新形式，积极参与党委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调查评估活动，使得协商结果在评估实践中不断得以修正完善。其次，注重协商后的信息反馈。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必须通过相应的信息反馈机制对协商结果进行回应，及时把一些有价值的协商意见建议转化为议案，定期接受群众对协商对话共识执行情况的监督。再次，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对未经协商或不采纳协商意见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以按照“谁办理、谁负责”的原则，形成必要的责任追究制度，以保证协商的质量。

充分利用新媒体，通过不同方式，传播和养成协商文化、协商意识、协商观念。大众媒体也是培养协商民主意识和个体参与协商能力的有效平台。一方面，大众传媒形成的社会舆论是协商民主中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大众传媒还可以将各种信息公之于众，便于群众参与讨论。将协商民主中涉及的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以及协商过程中相关问题公之于众，引导群体协商的注意点，并能引导协商民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只有这样，“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

政治文明



（上接1版）

从体制层面看，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坚强领导，能够凝心聚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做好金融风险防控工作。

因此，有效防控风险需要排除市场略有波动就是系统性风险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思维。金融市场牵涉多方利益，博弈结构复杂。股市、楼市、汇市、债市稍有波动，就有一些人跳出来，夸大渲染金融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误导网络舆论，或者给央行戴高帽，或者以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迫使监管层妥协。既要看到金融风险的危害性，也要有底气、有决心，要防范夸大渲染金融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防范道德风险。

以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为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上强调，“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一步防控金融风险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金融市场各种不利局面和极端情况的思想准备、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坚持早防早治，加强规制建设、监测预警和监管检查，防止单体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全局风险；坚持积极稳妥，分类施策，把握节奏，讲究策略，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坚持标本兼治，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防控风险中深化改革，稳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和规制性问题。坚持协同防范，统筹协调、共享信息，形成合力。

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以治标。积极稳妥防控重点领域风险，清除风险扩散蔓延的引爆点。严控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过快上升，稳妥推动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继续推进政府存量债务置换，严控“名股实债”等政府变相举债行为。严防房地产金融风险，严格执行差别化信贷政策，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积极应对外部冲击风险，继续落实“扩流入、控流出、补储备、稳预期”工作部署，加强对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和响应。稳妥化解不良资产风险，控制增量，处置存量，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健全流动性风险监管制度，开展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果断处置存在流动性风险的机构和产品。防范处置债券违约风险和股市异常波动，尽快推动完善信用风险处置的机制安排，对公司信用债开展摸底清查，细化处置方案。严管严控融资融券、场外配资、结构化嵌套等行为，加大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强化股东减持、异常交易等重点领域监管。防控影子银行风险。加快制定统一的资产管理产品规则标准，抓紧研究提出统筹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管理体系的意见，完善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政策文件。严肃整顿金融秩序。非法金融活动一律禁止，非法金融机构一律取缔。扎实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坚决遏制非法集资高发势头。开展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回头看”，制定有效整改措施。加强案件风险排查。

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以治本。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统筹用好各类政策工具，有效发挥逆周期调节和防范跨市场风险传染的作用，着力防控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泡沫。保持货币供给定力，将货币政策委员会转变为真正的决策机构，保证委员稳定性和专业性，发挥集体决策优势，强化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合力，管好流动性闸门。进一步改革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建立应对外部冲击的调控预案，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快建立金融监管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健全跨行业跨市场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统筹制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规则，避免监管空白，防止监管套利。坚持监管姓“监”，切实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完善防范金融犯罪的制度体系，查处一批大案要案。梳理和完善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处罚的制度安排，探索建立集体诉讼机制等基础性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追究，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全面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健康性以遏制道德风险。金融机构是金融风险的微观承担者。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提升董事会、监事会履职能力和决策监督水平，强化资本约束和内控合规管理，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推动金融机构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遏制大案要案滋生的主体责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发挥好存款保险处置平台以及各类保障基金的作用，依法推动高风险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金融市场是风险管理的重要平台。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是对风险实施合理定价和分散承担的基本场所，反之则会成为跟风等羊群行为的风险源。要积极向成熟市场经济体借鉴经验，扩大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允许符合条件的优质外国公司在境内发行股票，进一步提高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度和便利程度。不断完善征信、统计、反洗钱、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金融市场交易服务、跨境资本流动监测等金融基础设施。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

（上接1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一切弱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问题作斗争，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思想上强调理想信念“补钙”，作风上出台八项规定，打造了一系列把权力关起来的“制度笼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得整个党风政风明显好转。

必须看到，近百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始终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党内政治文化不断丰富创新的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推动作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创新担当等现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不断得到倡导和弘扬，党内政治文化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政治引领和思想源泉。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扎根于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土壤，离不开党和人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真切的奋斗实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有最深沉的历史使命和最宽广的家国情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高度重合在一起。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面临着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诸多考验。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其中必然包括党如何领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创新这一时代课题。比如：在我国快速进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实现有效应对和同步创新？如何增强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如何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如何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特别是如何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些最根本、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领导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实践中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的主动回应和重大决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就是要使党在思想、文化、精神上进一步强起来，更好地应对考验，迎接挑战。正是因为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和重大现实挑战面前找到创新发展的动力，找到可靠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我们相信，昂扬向上、生机勃勃的党内政治文化，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最新鲜、最强劲的动力源，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筋强骨壮、枝繁叶茂。

（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针对当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政治文化在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那里还相当有市场，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崇尚厚黑学，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打击竞争对手；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修为政之德，专练官场术；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凡此种种，既有党的领导弱化、党的领导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的因素，同时，也与封建腐朽文化的影响和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侵蚀有关。党风正，则社风清；党风不好，必然会带来社会风气的扭曲，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局。我们相信，在党内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反对腐朽落后的错误思想、错误观点，努力建设先进的、健康的、富有生机活力的党内政治文化，将有力地荡涤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消极、落后、腐朽的因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断净化和创新升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